

近日，阅读了有关范仲淹的一些史料，颇受启发，这位北宋名人的杰出业绩，着实让人感佩。

范仲淹（公元989-1052）是江苏吴县（即今苏州市）人，出身贫苦。宋真宗时应试中了进士，从此走上仕途。他在做了官以后，就宣称自己“以天下为己任”，始终清廉正直，关怀民间疾苦，主张革除盘剥百姓的种种苛政积弊。他在担任朝廷参知政事后，提出均田赋、减徭役等改善民生的十条建议。可惜，由于保守势力和权贵们的阻挠，未能完全实现。

在一本史书上，记载了这样一则佳话：宋仁宗年间，范仲淹率兵镇守延安，抵御前来进犯的西夏。西夏头领打听到驻守延安的宋军统帅是赫赫有名、足智多谋的范仲淹，吓了一跳，说范仲淹“胸中自有数万甲兵”，便不成而撤兵了。

范仲淹一生最大的亮点，是他不惧“犯上”的风险，敢于对朝廷“进谏”，即提出批评建议，说真话。为此，他几度遭到重大挫折，但他始终坚持正义立场，绝不妥协。宋仁宗时，开始仁宗年幼，就由刘太后“垂帘听政”，主持朝政。后来仁宗长大了，已到20岁，刘太后仍然死抓着

大权不放，朝内一切大小事皆由她说了算，仁宗只是个摆设。对此朝内大小官员都不敢吭声。这时，范仲淹站了出来，上了一道奏折，要求刘太后按祖制让位给仁宗。迷恋权力的刘太后看了折子大怒，立即下旨，把范仲淹贬职到一个边远小县，做个小小的通判。

几年后，刘太后去世，宋仁宗把

大权不放，朝内一切大小事皆由她说了算，仁宗只是个摆设。对此朝内大小官员都不敢吭声。这时，范仲淹站了出来，上了一道奏折，要求刘太后按祖制让位给仁宗。迷恋权力的刘太后看了折子大怒，立即下旨，把范仲淹贬职到一个边远小县，做个小小的通判。

几年后，刘太后去世，宋仁宗把

可敬的范仲淹

李音

范仲淹召回京城，重新起用。范仲淹依然如故，坚持与朝廷里的邪恶势力作斗争，发现问题就大胆“进谏”，对皇帝说真话，道实情。

有一年，宰相吕夷简大量提拔自己的亲信担任要职，结党营私，贪赃枉法，一时间把朝廷弄得乌烟瘴气。范仲淹发现后十分气愤，他经过深入调查，绘制了一幅“百官图”，具体揭露了吕夷简安插亲信的种种罪行，把这张图呈送给皇上。不料宰相吕夷简倚仗权势，恶毒反诬，再加上宋仁宗的昏庸，最终，范仲淹

未能把作恶多端的宰相扳倒，自己反而被贬官。

范仲淹依然没有退却。他在一首题为《灵乌赋》的词中，抒述自己绝不退却的激愤心情，词中有两句掷地有声的话：“宁鸣而死，不默而生。”意思是说，他宁愿为发出正义的呼声而死去，绝不默默无声地苟且偷生。这是何等可贵的精神！这八个字，实际上是范仲淹一生的写照。

范仲淹不仅是个刚正不阿、仗义执言的正直官员，他还是个颇有文学造诣、擅长写作诗词的大手笔。他的代表作是流传千古的名篇《岳阳楼记》。这篇不朽之作，充分展示了他的杰出才华和博大胸怀，文中写景抒情，文情并茂，忧国忧民之心跃然纸上，尤其是“先天下之忧而忧，后天下之乐而乐”的名言，更是振聋发聩，它的光辉思想，教育了多少后代子孙。

是什么力量使范仲淹毕生为伸张正义，克服黑暗腐败现象而奔走呼号？也许就是这“先天下之忧而忧，后天下之乐而乐”的信念。

无疑，范仲淹是我们的一面镜子。



与张学津先生一起的日子

上世纪60年代，张学津先生主演现代京剧《箭杆河边》给人留下了深刻印象！尤其他演唱的“赖子呀”一曲脍炙人口。我与张学津先生相识于70年代。那时，张学津先生携夫人奉命从北京抽调到上海京剧团《智取威虎山》剧组扮演主角“杨子荣”B组一角。当时的《智取威虎山》剧组和《龙江颂》剧组（我在《龙江颂》里扮演主角之一“小分队长阿更”）一起驻扎在上海东平路九号并一起工作，排练厅设在东平路旁边的衡山路一座教堂里。由于张学津夫妇从北京来，剧组安排他们借住在这个教堂旁的睡房里，一切生活起居都在教堂里运转。由于工作关系，我与张学津先生经常照面，十分投缘，在交往中我们成了挚友！记得当初，和他在一起工作的日子里，我经常会请教他一些在京剧艺术方面的问题，也经常让他在我唱腔艺术上做指导，有时还能品尝到他亲自下厨的厨艺！

“文革”结束后，张学津夫妇离沪回京，我调回上海昆剧团工作，继后又以访问学者的身份出国并移民到澳大利亚，这期间，我们分隔两地失去了联系。直到1994年左右，他应邀来悉尼演出京剧《坐宫》，扮演“杨四郎”一角，而我当时也正出演京剧《打金枝》“刘秀”一角。可想而知，在异国他乡久违的再见那种激动感慨，从而我们又恢复了联系。之后，我每年回国都要到北京看望他。那时他住在北京中央音乐学院旁边的楼里，他和我讲：“平时除了参加演出活动外，一般都在家里，喜欢自拉自唱，自娱自乐！”

每次我回国，张学津夫妇总是热情地在晋阳饭店招待我。他告诉我，他的夫人对他非常体贴照顾，因为那时他已经生病了，生病期间，妻子对他尽心护理，精心照顾，从而他的身体比之以前要恢复许多，他也总对我讲，上帝赠给了他一个贵人。我听到他这样说，也很为他高兴。

最后一次见面是在我2010年回国期间，那时在他新搬的建工大厦家里，他虽然身患重病，但我们见面时，他的精气神依旧非常好，他还给了我一个热情的拥抱，然后拍拍我的双肩，说了一句：“已经好久不见了！”这场景就像发生在昨天。记得当时，他还是与我兴致勃勃地谈论着京剧艺术，兴致来的时候还能唱上一段京剧。所以当时，他的这种乐观、酷爱京剧艺术、把病魔完全抛于脑后的精神深深打动着我们！我离京后，经常盼望与他再见并为他祈祷，愿他的身体能够战胜病魔，恢复健康，还希望能继续在他深爱的京剧艺术领域看到他的光彩。所以当我在澳大利亚突然听到他去世的消息时，真是很难相信一切会来得那么快。我陷入深深的悲伤中，为失去了一位师长和挚友悲痛，为京剧界失去了一位优秀艺术家而痛惜。



茅山有条瀑布，水流并不大，因为瀑布的走向有些特色，层层叠叠地分了三层，所以附近的施主们都很喜欢这条瀑布，闲暇的时候也会来走走。只是这条瀑布位于天明寺背面，所以平日在天明寺中完全看不到瀑布的样貌，也听不见瀑布的声响。

但天明寺也不完全是寂静的，除了清脆的钟声四季从不会停歇，还有一种生物的声音是这周遭环境里声音的主角。它当然不是戒言，因为戒言比较懂得养生，为了保持体力平时轻易不会叫的，只是在吃饭的时候才会兴奋地嚷嚷几下子。

这种喜好发声的生物便是藏匿在乱石堆和草丛中的蟋蟀。到了季节，蟋蟀会不停鸣叫，不分白天黑夜。

戒言师弟说，蟋蟀的发声器官是翅膀而不是嗓子。听到戒言的这番话，戒言更加钦佩蟋蟀了，想想它们一刻不停地扇动翅膀应该也是挺辛苦的，难得还坚持了那么长时间。

前段时间戒言去了趟宝光寺，走的时候天色已晚，便在宝光寺住了一晚。宝光寺和天明寺一

样，也是建在山里，宝光寺附近也有一条瀑布，只是比起茅山里的瀑布，宝光寺附近的瀑布更有气势。多股泉水汇集成一股疾流，然后坠落在附近的小水潭中。

那一夜，戒言睡得很不安稳，虽然瀑布距离宝光寺还有一段距离，但戒言还是能清晰地听到水流声。在床上煎熬的时候，戒言感叹宝光寺的师兄们也挺可怜的，每天生活在这种环境中，也不知道他们是怎么坚持下来的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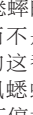
第二天吃早饭的时候，宝光寺的师兄笑着问戒言：“昨天晚上睡得如何？”

戒言原本并没有打算谈论这个话题，既然师兄问了，戒言便老实地回答道：“水流声一刻没有停过，我折腾了很久才入睡。”师兄诧异起来，有点儿疑惑地说：“水流声很大吗？我们没有一点儿知觉呢！”如此大的声音宝光寺的师兄却没有知觉，这样的回答着实让戒言感到意外。

戒言忽然想起前不久，宝光寺的师兄也曾在天明寺里住过一晚，戒言

蟋蟀与瀑布

释戒言



如果在当下中国文坛，有哪位批评家被人称之为“毁人不倦”的家伙，会招来什么样的后果呢？

我能想象得到的是：大概被他批评过的作家，轻则在公众场合相遇时会向他翻白眼，重则在背后吐唾沫，也可能把他告到法庭上去。也曾有过拳脚相加的个别案例。当然，被批评者也可能将他“居心不良”的批评行为告到主管部门去。其次，他的“毁”人行为，也可能招致同行的鄙视和疏离，害怕与其为伍；同时，这样的批评家如果没有甘于孤独的精神和胆魄，大概偶尔“毁人”一两次的，也就赶紧“刀枪入库，马放南山”，与作家和批评家同行共谱“和谐”曲了。

也因此，当我看到某篇文章介绍德国享有世界声誉的批评家马塞尔·赖希-拉尼茨基，其一生批评的座右铭是：“能够毁掉作家的人，才能做批评家”时，脑门就“轰”的一声：惊诧、意外、震动！更“过分”的是，拉氏还认为，批评家的一项天职，是给作家“颁发死亡证书”。拉尼茨基既然以“毁人不倦”为座右铭，那么他的一生究竟“毁”掉了多少作家呢？未见更多资料介绍，我想找他的批评著作来读，目前也找不到汉译本。从网上只购得两本中国学者写的传记。他自己写的回忆录《我的一生》早就脱销。从不多的介绍文字可以了解到，拉氏的批评文字确实犀利、及物、毫无顾忌。同为批评家的约翰姆·凯泽称他是“最令人生畏，最引人注目，所以也最招人恨的文学批评家”。他在批评作家瓦尔泽小说《爱的彼岸》时，直言这本书尚在“文学的彼岸”，“为他好，同时也为了我们自己，希望这本书尽早被人遗忘”；他

也曾问过他同样的问题。

结果宝光寺的师兄说：“夜风中蟋蟀的鸣叫声太大，吵得我无法入睡。”

听到他这样回答的时候，戒言也很诧异，因为戒言一直觉得蟋蟀的声音并没有大到会影响睡眠的地步。

其实应该这样说，蟋蟀的嗡鸣从来没有停止过，但戒言没有在意过；瀑布激流声一直在响，但宝光寺的师兄没有在意过。

其实生活中的许多事情都会有这样一个渐变的过程，许多发生在我们身边的不寻常的事情，随着时间的推移也会变得寻常，渐渐地变得不再引人注意。

因此，我们最容易忽略的便是身边的人。我们常常会对自己身边最体贴的关心、最浓的爱视而不见，这实在是一种最令人叹息的习惯。

在评论格拉斯的《说来话长》时，刚说完某个段落写得尚好后，就不无刻薄地讥刺“这本781页的书，就这5页拿得出手”。在格拉斯获得诺奖时，拉尼茨基在表示祝贺后说：“即使这个奖对格拉斯是合适的，我们也不应该隐瞒，他主要是以早期的作品和一些中期的作品获得该奖的。他最近的几本书，让我和更多的人失望。”

因为“毁”人不倦，拉尼茨基招来被批评者的厌恨是必然的。有一位作家，在对他的批评厌恨至极后，居然以他为原型写了一部小说《批评家之死》来诅咒他。此事在德国学界和读者中曾引发轩然大波。

拉氏虽以“毁人不倦”为天职，但有些作家并未因为他的“打击”而毁灭，反倒在刺耳声中，变得更强大、更优秀。甚至有作家声称：“他批评我，所以我存在。”拉尼茨基今年去世后，德国联邦总统以及数百名德国政要和名流参加了他的葬礼，最有影响力的媒体称誉他为“德国文学批评巨星”。

由此，我思索：批评家与作家的关系究竟该如何定位？是“战友”？是“恋人”？是“同志加兄弟”？是“天敌”？或许各种不同的说法，都可以找到所谓“学理”来支撑。我倒更愿意把批评家比喻为“鲶鱼”，因为它的凶猛，而使船舱水中的“沙丁鱼”不敢懈怠，它们必须拼命地挥发全部体能不停地躲避鲶鱼的攻击，因此反而变得更壮硕、更灵动、生命力更加勃发，因而也就活得更长久。

“沙丁鱼”该感谢“鲶鱼”，还是诅咒“鲶鱼”？当代中国文坛是不是该多些“鲶鱼”？文学会因此变得更好些，还是更差？恭请懂文学和批评的人士来回答。

陈歆耕



文坛呓语



书法

林仲兴

我是1963年进入人民沪剧团的。记得第一次去文牧家，他引我走过石库门的公用客堂时，很自然地对邻居说：“这是小宋，是我的学生。”那么亲切，那么温暖。从此他写字台台板下压着的戏票就成了我的专利。他的稿纸都不是从单位里领取的，是他自己掏钱买的，那纸上有的写了几行字，有的才写了几个字就被他揉成一团丢了。让我心疼的是：这些都是他熬了一夜又一夜，又一张接一张废弃的。他写的太辛苦，太追求完美了。慢工出细活，他笔下的人物，如小飞娥，阿庆嫂，刁德一等都是独一无二的艺术典型。只有他有本事把赵树理晋味十足的小说改编成沪味醇厚的《罗汉钱》。没人比他更熟悉

沪剧，也没有人比他更了解本土的市井生活。所以也只有他能写出类似“阳澄湖里蟹正肥”，“五尺芦苇只没剩一个尖”这样独一无二的唱词。读文牧的唱词是一种美的享受。既能闻到清新的生活气息，又能品味沪语文化的神韵节律。

在戏剧界，宗华、文牧的大名常被连在一起，其实他们的艺术风格各有千秋。文牧的戏即使是悲剧也蕴含幽默。而宗华的戏几乎每一出都能以情动人。她的《星星之火》母女隔墙对唱，几代演员唱一次落一次泪。她的《甲午海战》金棠妈“祭海”，悲愤之情，似汹涌的海潮冲击心灵，令人欲哭无泪。她改编的《雷雨》沪剧本，唱词也不经意地渲染了

原作的悲剧氛围。

这些年，想起宗华心就会揪紧。她写的太用功也活得太累了。一辈子背着“家庭出身”的十字架，处处谨小慎微，低调做人。而剧作家的使命感又让她以最大的热忱拥抱生活。忘不了她带着我一起在“和平丝绸厂”挂职体验。一起在星火日夜商店站柜台值通宵夜班，笑迎天边第一缕曙光。一起在太湖边常熟城采访“金绣娘”。更忘不了她因心脏病复发住院治疗时，把我叫到病床前，殷切地要我跟她一起再写一出反映医

昨夜情 今朝思

宋之华

患关系的戏。要知道，那时她已经心力交瘁！

杨观复对导演艺术的追求精益求精，孜孜不倦。他遗留下来的数十本工作手册，密密麻麻地写满了蝇头小字，每导一出戏他都能做足案头工作。他导的戏节奏流畅，格调细腻，动静和谐，朴素自然。传情又不煽情。在他获得文华大奖的《明月照母心》中充分地展示了导演功力。

排练现场，他常会一边盯着演员表演，一边不停地搓手。熟悉他的演员都明白，这是老杨在想高招“磨”戏。他不太稀罕会演颁奖的机会，却十分珍惜能边听意见边修改的排练时机。他说：“好戏是‘磨’出

来的。”

这些年来我的初稿都是他第一个看，他会在我埋头改剧本时悄悄地塞上一块巧克力，会在友谊关中越界河前的小路上挺身挡在我身前，因为那里时有冷枪。看似在他眼里我就是小一辈的，没想到，我跟他这位前辈成了搭档，也许真是有缘吧！戏搞了不少，大都已淡出人们的视线，也许《逃犯》《金绣娘》《雾中人》还有点印象。值得回味的是我们曾经一起承受创作过程中的风风雨雨，一起共享过艺术追求的愉悦和惊喜。

沪剧也可以借鉴“奥运会”的导演手法。

十日谈

沪剧春秋